

政治人类学评论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view

2017 · 1

# 新政治人类学范式

Paradigm of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

第 5 辑

陶庆 ·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建立新政治人类学就是要创造新  
以适应该国家化 (deterritorialization) 和去管制化 (deterritorialization) 的理想世界  
去集中化 (decentralization) 和去管制化 (deterritorialization) 的理想世界  
为什么我们需要政治人类学而不是单纯的政治理论  
或者仅仅是人类学? 正在于它能够超越各种理论、框架、  
这些框架已将政治本身蜕变为制度。  
或在不知不觉中间离政治, 或在空虚中制定抽象原则。  
新政治人类学固然有其弱点, 但它仍是培养全新科学的基础。  
这种新科学的深度和注意力能够涵盖  
林林总总的全球性、越级现象、的形态学意义  
从新部落主义到气候变化, 到越民族主义,  
到所谓民族国家的衰落,  
到后人文主义的兴起等等, 不一而足。

第 5 辑

政·治·人·类·学·评·论 (2017·1)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view

# 新政治人类学范式

Paradigm of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

陶 庆 ·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政治人类学范式/陶庆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17

(政治人类学评论;第5辑)

ISBN 978-7-5520-2127-1

I. ①新… II. ①陶… III. ①政治人类学—研究  
IV. ①D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0505 号

## 新政治人类学范式

---

主 编:陶 庆

责任编辑:路征远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720×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20.25

插 页:2

字 数:266 千字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520-2127-1/D·461

定价: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办**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政治人类学研究所 (筹)

**主 编**

陶 庆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骏 王浦劬 朱光磊 刘建军 阮云星 李俊清 何国强 纳日·碧力戈  
范 可 林尚立 罗红光 和少英 竺乾威 金太军 周大鸣 周 平  
赵旭东 胡 伟 钱 杭 徐杰舜 徐 勇 高丙中 郭苏建 常保国  
商红日 董建辉 Chuan-Kang Shih Janine R. Wedel

**编委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徐 勇 高丙中

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学术刊物”类建设项目

“《政治人类学评论》（培育）”

资助成果（A-0312-17-307107）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重大项目

“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资助成果（11JJD810018）

# 前 言

陶 庆

“新政治人类学”(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 NPA)是相对于长期以来片面地作为文化人类学领域一个分支的“政治人类学”而存在的一种跨学科理解范式,在本辑中,这一范畴是作为一门学科来介绍给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学者朋友与研究生同学的。在过去长达四年多的研究生教学活动中,作为主讲教师,我一直在努力给出“新政治人类学”一

个完整而全面的定义与概念。尽管我在《政治人类学评论》第2辑《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的《代序》、论文《新政治人类学: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与民族志“写文化”的统一体》,以及后来整理完善并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论文《新政治人类学:一种跨学科的理解方式》等文献中,一直尝试这样做。但是事实表明,实际上我根本不可

---

作者简介:

陶庆(1965— ),男,安徽宁国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奖”,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研究员,《政治人类学评论》主编。

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

这次由 2016 级行政管理专业(科学型)部分研究生们整理出来的系列材料,它在实质上是该研究生课程教学材料的整理与提炼,可以说第一次较好地反映了我心目中所谓“新政治人类学”范式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结构。

“范式”奠基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提出了“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与“有序元素”(ordered element)等两个范畴。这也是“新政治人类学”据此产生与演化的关键要素。尽管“新”“旧”两种政治人类学具有许多学术关联与共同旨趣,但新政治人类学显著不同于旧政治人类学的地方,在于它旨在发掘具有范式内涵的“有序元素”,即其“四观”组合(unity of four elements of NPA): 时间观、空间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和标志范式特征的“学科基质”,即其“五化”过程(five processes of NPA): 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管理学人性化、政策学真理化。文

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论、民族志的独特书写文化,赋予了多个学科新的学术生命力与实践创新力,产生了超越原本学科所能想象的质的飞跃,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前景。新政治人类学与其原生母体政治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诸种交叉学科领域的生命“脐带”,主要体现在“五化”与“四观”等九个方面。新政治人类学“学科基质”——“五化”过程——是通过“有序元素”——“四观”组合——来展示范式革命的五彩魅力,而“四观”“有序元素”则通过“五化”“学科基质”(过程)来勾勒出范式革命的内在本质,两者不可分割,互为一体,展示出新政治人类学的“五化”“四观”辩证同一性。新政治人类学与旧政治人类学两者虽都旨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立场方法与观点来研究某种政治实践的“社会事实”,新政治人类学的“五化”“学科基质”与“四观”“有序元素”具有交叉跨学科的显著特征。旧政治人类学试图从文化上来解释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某种特殊类型的权力运作模式,而新政治人类学则强调政治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

政策科学、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诸种交叉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它试图从新的视角来诠释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所有对“他者”具有某种控制力的“权力现象”及其权力运作体系。如同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出现一样,新政治人类学范式的兴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成熟”起来,相反它往往是政治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诸种交叉学科领域中的先贤智者,自觉与不自

觉地迈出各自学科“领地”,向着未来共同目标即新型“学科基质”探索耕耘的漫长过程,是不断积少成多,厚积薄发,从受人排斥到为人接纳、从个别现象到一般共识、从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的复杂进程。作为一个相对于旧政治人类学的新范式,新政治人类学学科似乎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强化“五化”与“四观”的一体化研究与发展,这正是新政治人类学能够唤起跨学科交叉领域诸学人重新思考的地方。

2017年4月18日

于师大新村



# 目 录

---

前言	1
1 新政治人类学：政治学科学化的维度 / 王 瑞	1
2 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抱负” / 施 玥	35
3 民族志壁垒与民族志写文化 / 李 雯	65
4 管理学人性化 / 冯 煜	99
5 政策学真理化 / 马方云	116
6 新政治人类学时间观 / 李书颖	141

7 新政治人类学空间观	
/ 崔馨月	160
8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实践观的本质回归	
/ 冯 雷	190
9 新政治人类学的意识形态观	
/ 李吉莹	219
摘要 (英文)	241
后记	302
征稿与撰稿体例(修订)	304

# CONTENTS

---

<b>Preface</b>	1
<b>1 Overview of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tization</b> / Wang Rui	1
<b>2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s Ambition for Power</b> / Shi Yue	35
<b>3 The Barrier of Ethnography and the Ethnography Culture-writing</b> / Li Wen	65
<b>4 Humanization of Management</b> / Feng Yu	99
<b>5 Analysis of the Policy Truth-Verification of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b> / Ma Fangyun	116
<b>6 The Time View of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b> / Li Shuying	141

<b>7 The Space View of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b>	
/ Cui Xinyue	160
<b>8 The Essential Return of Practice View in Marxist Anthropology</b>	
/ Feng Lei	190
<b>9 The Ideology of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b>	
/ Li Jiyong	219
<b>Summary (In English)</b>	241
<b>Epilogue</b>	302
<b>Calling for Submissions (Revised)</b>	304

# 新政治人类学：政治学 科学化的维度

---

王 瑞

**摘 要：**政治学科学化历程及维度，政治学学科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对城邦制度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等力图通过对基础城邦制度的研究揭示人类政治活动发展的规律，并试图利用这种规律预测今后政治学的发展进程，此时的政治学学科实为政治哲学。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的影响，政治学研究逐渐对研究过程中的科学性提出要求，理性主义与法治理念的加入使得政治学所要思考的课题愈来愈多，同时价值在政治科学中的作用也日渐式微。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引发西方社会行为主义革命的爆发，刺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成长，政治科学的诞生也就成为必然之势。20世纪初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弊端逐步呈现，政治学家开始结合社会现实对该制度进行反思，提出后行为主义理论，又称为新制度主义，相对于古

---

作者简介：

王瑞(1994— )，男，安徽黄山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

希腊时期的旧制度主义而言,新制度主义在对制度重新重视的基础上,结合行为主义理论精髓,继续充实政治学理论。实质上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并不是政治学学科的双重分野,而是对政治学这一研究对象的不同角度的解读。

**关键词:** 政治科学 行为主义 新制度主义 田野研究 科学化

## 导 论

政治科学发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二战”后世界形势复杂，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趋于复杂，国内国际问题层出不穷，世界主要参战国百废待兴，政府责任凸显，不同于战前简单的政府职能，政治学家积极研究政府在复杂社会矛盾下应当发挥多样性的作用，而传统政治学将目光锁定在国家制度层面，忽视国家之外的大量非政府社会机构的作用，显然不再适用于战后的政治环境。政治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大致经历了传统时期、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三个时期。传统阶段以历史、法律、制度的研究方法为主。历史研究方法即按编年史的方法对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搜集、整理和分析，根据丰富的史料描述某一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认为历史主义是政治研究制度的基本方法，目的是要找出各种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发展规律，并据此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法律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即从法律条文入手，探讨由宪法、

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等构成的法律体系所体现的政治制度，同时，也要求对不同的政治制度进行描述，并对政治体例中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国家制度、政体形式加以比较。行为主义也被称作实证主义，主张价值中立，要求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对政治的运作过程进行细致刻画，尤其是在传统政治学所忽视的政治行为等动态领域。后行为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行为主义的反思基础之上，该主义看到行为主义在对政治行为研究方面的先进性，也看到其在重视行为的同时忽视政治学传统的制度研究的重要性，主张将制度与行为结合，以弥补行为主义的不足。

### 一、政治学科学化今昔

#### （一）善治与“科学”的政治学

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学科的开山之作《政治学》一书中通过对古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梳理，系统性地对政治的轮廓进行描述与总结。首先，亚氏对政体进行了归类，指出“法治相对政体而言，只是一种治理方式，处于从

属的地位”(丁艳雅,2006/4)。一方面,根据城邦是否把“善”置于首位将政体归类为正宗与变态政体;另一方面,根据最高统治者的人数又将两类政体进行细分,其中“理想政体应该是城邦凭以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亚里士多德,1965:366),他认为美德与善是理想政体的重要指标,公民幸福快乐的生活尤为重要。再者,他批判一人之治的弊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凡不能维持法律权威的城邦都不能说它已经建立了任何政体。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同上:192)。他主张法律至上,构想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制度,认为法律犹如支架一样构筑起城邦这个庞然大物。最后,他还强调中产阶级在政体中的重要作用,当时希腊城邦贵族与平民冲突不断,需要一个处于平衡点的中间阶层来稳定天平的两头,他将这种中庸之道的政体表述为“共和政体”。“首先对一些我们普遍认可的基本前提进行界定,并由此出发进行推导,最终得到某种我们已知的结论。”(Thomas Hobbes,1839:309)古希腊时期,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西塞罗等为代表的先贤

研究城邦这一基本政治形式,试图从城邦的起源、演变以及性质探求人类最原始的政治属性,为日后西方政治学提供研究蓝本,奠定了法治与民主为支撑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

亚氏在对政治科学的定义中总结出一般学科中的“科学”界定方式,第一,该学科要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它们的是什么是种上属于同一门科学”(亚里士多德,1993a:86)。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的重要前提,“种”是亚氏提出的一个创造性的观念,是系统科学产生之前散乱而混杂的研究对象,指代一类研究对象的集合。第二,该学科的研究要求关注研究对象的共性,“如若没有任何在个别之外,那就会没有被思想的东西”(同上:74)。科学研究不是对单个研究对象的分析调查,而是对所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共性进行抽取提炼,某个个体在一定时间、地点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所显示出来的些许特征并不在科学的研究范围中,这里的共性,与其说是对研究对象的要求,更不如说是对学科的要求,亚氏认为学科成为一门可研究的科学对



研究对象共性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三,该科学的研究对象要有恒常的存在性,“一切科学都以恒久存在的或经常存在的东西为对象”(同上:255)。这里的恒常,笔者以为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时间上的要求,研究对象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二是空间上的要求,在不同的区域均能够找到其存在的痕迹。同时,在强调普遍性的同时,他还提到了特殊性的作用,“现实则是确定的并属于确定的事物,作为这个,它属于某一这个。所以科学知识,一方面显然是普遍的,另一方面又不是”(同上:183)。这里并不是说亚氏在这一方面也存有疑虑或者矛盾,实质上,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是科学研究的重点,而特殊性则可以作为补充被纳入到科学研究中去。第四,亚氏总结出“科学具有可证明的品质”(亚里士多德,1993b:123),最后亚氏强调作为一门科学,应当能够被证实或者证伪,在现代科学看来,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还是新兴的社会科学,在“证实性”方面都难脱其责,亚氏用基本的逻辑构建科学框架。

上述条件仅仅是亚氏提出的学科成为科学的基本要求,“只有科学才是真正的智慧”(亚里士多德,1993a:29),亚氏将科学等为其所理解的智慧,同时他辩证地认为科学本身并不是智慧的渊源,因为科学是事实存在的事物,只有被科学研究者带有目的性地以某种方式进行探究,从中得出的真理才是智慧。理性的重要性得到亚氏的推崇,“科学就是对普遍者和那出于必然的事物的把握”(同上:68)。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理性思辨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科学并非只是零散的资料堆砌,理性作为强有力的黏合剂对科学大厦的一砖一瓦进行有序的整合。再者,他指出“智慧既是理智也是科学,在高尚的科学中它居于首位”(亚里士多德,1993b:127)。如前所述,亚氏认为真正的智慧是科学与理性的结合。亚氏对“科学”的重视可见一斑,从其对学科“科学化”的基本定义就可以看出,理性的认知手段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所有学科的“科学化”过程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具体的“善”实现过程中,亚氏认为正义与公平不可忽视,对于前者而言,正义是实现善治的重要